“潜伏”谍报战

本报深度记者
寇润涛 刘志浩

1940年冬,日本侵略者以5万人进攻山东抗日根据地。八路军山东军区则在日寇发号施令的中枢济南,开展了一场情报站。

没有正面战场的轰轰烈烈,也看不到奋勇杀敌的个人英雄。在没有硝烟的谍报潜伏战里,所有人都默默无闻地存在着。

王东儒不时沉思,回忆勾起他对情报战中牺牲的先烈们的追思。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摄

想当八路军却成了“特务”

5月3日,济南舜耕中学对面的一处民居里,88岁的王东儒拿出自己10年前写的一本回忆录。对这位老人来说,10年前还记忆犹新的往事,如今已成支离破碎的片段。

“打鬼子的时候我还小,不过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了。”王东儒一边对我们说着,一边卷起左腿裤脚,腿上的静脉曲张非常明显,蜿蜒的血管记录了老人70年前那段神秘的人生。

到底有多么神秘?

老人摇了摇手,脸上的笑容舒展开来。他告诉我们,自己当时是一位情报人员,如今看来,神秘或许只是因为当时他的身份需要保密。

那一年,他17岁,参加了中共领导的“潜伏会”。

王东儒的老家在济南南部的杨而庄。每天,王东儒都在私塾里跟着一位晚清秀才学习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。老师已有73岁高龄,对里面的章节张口就来。

有一次,两个八路军来到私塾。因为两个人经常到附近村里来,王东儒一眼认出了他们,“李子亭和黄玉祥。”

李子亭和黄玉祥此行是号召广大青年和学生踊跃参加八路军。

站在老秀才的三尺讲台前,二人对学生们说:“在国破家亡、动荡不安的时代,这样能打日本鬼子吗?能治国吗?”

于是,思想进步的学生互相串连,很快形成了参军热潮,十几个人的学校,先后有7个同学参加了八路军。

王东儒参加了“潜伏会”,会长叫王均。

“平时没有任务的时候,该上学的上学,要潜伏起来,避免被人发现自己是搞情报的。一旦接到任务,就以学生的身份,去收集所需的情报。”这就是王东儒的“潜伏”任务。

王均是谁?

1940年冬,日本侵略者以5万人进攻山东抗日根据地,名为“铁壁合围”,进行“梳篦式扫荡”。为此,八路军山东军区决定,在日寇发号施令的中枢济南,成立济南“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”。这个委员会包括济南、张店、泰安三个城市和津浦、胶济两条铁路线,简称“济、张、泰情报站”。

“王均”是化名,真名叫牛瑞符,时任济南战略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党支部书记。起初,王均手底下只有3个人,在历城南部山区周围活动。

在历城南部山区,日军、伪军对这里控制极严,以仲宫为主,在西营、柳埠、桃科、高而等地设有据点,区乡均设有伪政权,村设有保甲长。长清县张夏车站的鬼子经常与仲宫的鬼子来往,在桃科挖掘镍矿。

这里山高谷深,小山村五六户人家,大村也不过几十户。鬼子三天两头扫荡,很多人受生活所迫去济南谋生。

在王均看来,给日军、汉奸干活的有些人,“只要经过耐心说服教育,就有可能转化过来为我所用。”

一个偶然的机会,王均认识了打铁壶、炉筒子的手艺人姜仲三。他之前在哈尔滨、济南做工混饭吃,在济南铁路大厂也有不少朋友。

王均发展姜仲三为“下线”,让他在济南铁路大厂发展情报关系。铁路大厂动力车间有个技术员叫王印增,不久后,王均便约王印增到姜仲三家里见了面。

“当时,上级指示要拿到济南车站和铁路大厂的平面图,要求把明显的目标画出来。”如今,王东儒对我们揭开了当年的这个秘密。

王印增和姜仲三接受任务后,及时完成了平面图的绘制。当时,国共正团结抗战,不到半月,空军飞机就根据平面图的目标轰炸了济南车站和铁路大厂,动力车间被炸得尤为厉害。

通过不断培养,王均的情报人员越来越多。通过他们,八路军源源不断地获知敌情。

1945年,王东儒也从一名初级“潜伏员”成长为情报站人员。

神秘的电台

1944年2月,山东军区情报处处长邝任农决定在济南地区建立电台。

王东儒现在再次回忆起“电台”的事情,依然难掩兴奋之情。“就是这部电台,让日本鬼子烦透了,怎么找也找不到。”

建电台的事,是李惠民具体操作的。当时,李惠民正在山东军区司令部轮训队学习,突然被任命为电台台长。

脱下军装,李惠民和两位侦察员来到济南南部山区,与王均接头。

起初,电台只有1名报务员,以后又派来了译电员。电台工作间选择在离住户较远又比较隐蔽的农具室、牛草屋。午夜发电报,拂晓收拾干净。

一发报,王均就帮着架线、警戒。白天活动时,王均穿长袍长衫,打扮成商人,李惠民穿着破棉衣、棉裤,戴一顶破毡帽,背着钱褡子,打扮成小伙计跟在后面。

电台建立了三四个月后,济南的日伪军就发现近郊有不明电台在发报,派人暗中查访,并多次出来扫荡搜查。仲宫的日本鬼子也带着伪军多次夜袭柳埠、高而庄、储泉沟等。

由于情报站和群众及时通风报信,电台及时转移,没有遭到损失。

后经王均等人研究,电台搬到了泰山后山的一个山沟中,这个地方山高沟深,草木丛生,人迹罕至。这里有一个用木架搭起了小棚子,原来是鲁中军区情报组用的。

当时只有3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——李惠民、宋勤和魏佃三。他们半夜里工作,收发的电报均由魏佃三送到几十里外的情报站联络点去,从未发生过问题。

电台的安全问题和日常生活由情报站地下交通员徐文有负责,他在山下租种了庙里和尚的几亩山地,电台的事情连父母和弟弟妹妹都不知道。

下大雨就更麻烦,几个人住的是窝棚,外边下大雨,里面就下小雨,只好顶着雨布收发报,不能睡觉就顶着雨布坐着,以免机器和电池受潮。就这样,他们一直坚持到1945年8月。

由于地下工作的特殊性,除王均外,完整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并不多。直到上世纪末,依然没有人对这段历史进行挖掘、研究。

作为一名参与者、知情者,王东儒一直关注着这段历史,将过去千方百计收集的有关材料整理成册。这才揭开了这段70年前的机密,以及这场由中共领导的抗战地下谍报战。

抗战日记(八)

对学习未放松过

苏蕴山
原115师司令部机要科长

1941年1月

元旦日,于聂家庄召开全直属队的干部大会,进行各项比赛,给了一些优胜者奖品。

1日至7日,在聂家庄,工作很多了,整体都在忙着工作与学习,工作、学习都很紧张。

7日晚,因有情况,从聂家庄移至茅沟宿营。

7日至28日,都在茅沟,工作学习都很紧张。

29日晚,移刘家河疃,50里路。

2月

全月都在刘家河疃驻未移动。有如下情况。

工作很忙,大多数时间在进行工作。学习上能很注意,每天都能抽出时间读书。而且参加了分局党校几个礼拜的旁听课,党的建设一节未听完,对学习未放松过。

本科发生了几个(件情)。一是同特务长吵了一顿,闹成打架,为此事我在几次党的会议上受到批评,二是我和冯彦的关系问题,经过几次会议才解决好。

译电训练班已走上正式课程,每天都讲几堂课,且进行了全体学员的(政治)审查,给了各个不同问题的解决。

3月

5日发生情况,由刘家河疃移到官庄宿营。

6日晚,由官庄移房南庄,情况很紧张,走了60里路。

7日,由房南庄出发,经汀水、汀河等地,到了西许口宿营,行军40余里。

12日,由西许口移至渊子崖宿营,走了30里。

17日,由渊子崖移到后寨子,15里。至31日均在寨子休息。

4月

本月都住在后寨子。

译电训练班学期已满,于本月2日毕业,会了餐,开了晚会。用了几天时间进行总结,请了师首长讲话。

师直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于本月8日开幕,至14日闭会。主要内容是罗(荣桓)政委报告目前形势,萧(华)主任作政治工作建设的报告,部队工作总结、选举总支等。

经过参谋长解决了本科的一些工作关系问题,对科长提出了一些意见。于18日开始开部务会,至24日才结束。主要是总结第一期整军的工作,讨论第二期整军的工作,解决许多具体问题。学习生活都很紧张与注意规律。

5月

29日,发生情况,敌人分三路合击寨子,紧张一时的状况,于是我们移走了,到了十字路附近,晚上12时转入韩家岭宿营,有70里的行程。

“五一”节举行了干部竞赛,总结了一年来的学习成绩,听了朱(瑞)政委关于思想方法领导方式的报告,到党校及轮训队听了几个报告。

是月中旬举行了几个歌舞剧团的联合公演,时间很长,演出李自成之死等名剧。

发生小问题,使自己想得很苦闷。

29日拂晓,敌人钻到我们驻地来,接近到自己的面前(才)知道,结果使自己跑乱了,部队跑散,一部跑得很远,且丢失了一些东西,(暴露)一些问题,事后经过严格的检讨,并提出教育部队。

6月

13日,由韩家岭经韩村,走30里,进到蔡庄宿营。

①工作学习平常,经过几天的战斗后,在学习方面有些差。

②在西盘驻,去(教)2旅司令部检查了三四天的工作,对2旅机要股的工作有了初步了解,解决了问题,给了他们工作上的指导,调动几个同志的工作,还算收到了一些成就。廖生东、李春荣于6月27日回师部的。

(未完待续)

请讲

反“扫荡”:以“三空”对“三光”

□徐畅
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

所谓“扫荡”,本意是指彻底清除,兼指一种军事行动。抗战时期的“扫荡”,是指日军聚集大量优势兵力,集中对某一地域发起军事进攻,企图彻底消灭敌对力量,达到所谓“治安”的目的。

从1939年开始,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“扫荡”,据不完全统计,1939年至1940年,千人以上的“扫荡”25次,其中万人以上的2次。1941年至1942年,日军千人以上的“扫荡”70余次,万人以上的“扫荡”9次。

1941年之后,日军的“扫荡”不仅次数增加,而且战术发生巨变:第一,由短促突击式的进攻,转为长期的“清剿”、“驻剿”。第二,由分散的、小股兵力的“扫荡”,转为集中优势兵力的“扫荡”。第三,由长驱直入的线式围攻,转为步步为营的纵深“扫荡”。

1943年之后,山东军民逐渐在反“扫荡”过程中赢得主动。例如,根据地军民主动粉碎了日伪军1943年冬季大“扫荡”,并在局部地区展开反攻。在1944年取得一系列反“扫荡”胜利之后,1945年夏季,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举行了攻势作战。

日军“扫荡”过程中,实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,大量使用化学武器,公然发动细菌攻击作战,制造了大量惨案和“无人区”。

为了躲避日军的屠杀,根据地老百姓在中共和八路军的指挥下,积极投身到反“扫荡”斗争中,实行“坚壁清野”,以“三空”(搬空、藏空、躲空)对付日军“三光”(抢光、杀光、烧光)政策,老百姓往往把躲鬼子的过程叫做“跑反”。

一般而言,日军大规模的“扫荡”有一个过程,军队调动总会有动静,八路军会获得相关情报,所以往往是日军还没有开始“扫荡”,老百姓就已经知道消息,开始做“跑反”的准备工作。在根据地军民监视下,日伪要想完全做到“悄无声息”地扫荡是不可能的。

从方向上说,老百姓“跑反”,一般是逆日伪“扫荡”而动。从地点说,因自然环境不同,千差万别。在鲁东、鲁中等山区,“跑反”往往是朝山上跑。在鲁北、鲁西北等平原地带,因无山水做掩护,老百姓一是跑向自然存在的庄稼地、坟地、坡地,二是跑到人为改造的道沟、地道。在滨湖地区,老百姓往往朝湖中央和芦苇荡里跑。

由于日军时常“扫荡”,根据地老百姓的粮食、日常用品往往早已藏妥,家中几乎每人都准备几个或一个包裹,随时准备“跑反”。

资料来源: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《齐鲁烽火》杂志